

哲學論述與政治現實主義：

全球西方

二十世紀的遺產

史蒂芬·霍格爾博士撰文

一位哲學家的呼喚

軟體生成未經核實之譯文

二十世紀第四版初版

目錄

哲學、歷史、政治：政治現實主義與全球西方 5

全球西方：普世主權的哲學與願景 7

西方的公理 18

後記：未來二十五年的三項準則 19

無論歷史在我離世後如何評價我，我只盼它能記載：我喚醒的是你們最美好的希望，而非最深的恐懼；激發的是你們的信心，而非疑慮。我的夢想是，你們將沿著自由之燈照耀的道路前行，讓機遇之臂穩穩托住你們的步伐。

羅納德·雷根 (1911-
2004) ¹

獻給自由之友

1

摘自1992年8月17日於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演說。羅納德·雷根為美國第四十任總統，曾與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啟動影響深遠的緩和政策進程。

犬儒主義者視價值觀為等價工具；政治家則以道德信念為實務決策根基。……對我而言，現實政治的明智定義在於：存在客觀情勢，若無視此等情勢便無法推行外交政策。試圖在不審視各國所處環境的前提下操弄國家命運，實屬逃避現實。¹

亨利·A·基辛格（1923-2023）

哲學－歷史－政治：政治現實主義與全球西方

鮮少有歷史時期能如二十世紀般，將哲學、政治與世界史如此戲劇性地交織，而我們至今仍身處其餘波之中。

即便歷法上已結束四分之一世紀，其遺產仍鮮被察覺，這正是諸多政治衝突未見平息之因。此現象於世界政治舞台尤為顯著，各類緊張局勢與對峙陣線層出不窮。當今局勢之複雜令許多當代人無所適從，昔日對美好未來的期盼早已讓位於無奈的宿命感。

在國際關係領域尤需這類政治人物——

他們不為虛妄野心驅使，而是以個人責任感與必要遠見履行職責，換言之，他們深諳*現實政治之道*。正如被譽為現實政治家典範的亨利·基辛格在引文中所言，這意味著必須考量客觀條件，因此我們需要一位依循當下情勢（即現實）掌舵的領航者。

確實，任何欲駕船穿越險灘之人，必須時刻關注其他船隻、自身潛力及潛在敵人的實力。舵手會留意任何可能產生影響的因素。對他而言，關鍵在於事實與實際狀況：即現實的視角。

然而他胸中理想主義的靈魂，卻敢於越過海洋地平線凝望——
雙重靈魂在他胸膛共鳴²

。即便在風暴肆虐的海面，它仍追尋著希望與信心的島嶼。
月光下，船長哼唱著和平友誼的歌謠，全球兄弟情誼的讚美詩觸動心弦。
但洶湧海浪的風暴

¹ 摘自2009年7月5日《明鏡》週刊（28/2009期）專訪。

² 基辛格：「沒有理想主義的成分，就沒有真正的現實主義。」

淹沒了細膩旋律。理想猶如凝望星夜：誰能斷言眾人皆能從中讀出相同訊息？

在現實與願景的對立間，經驗豐富的舵手必須銘記第三維度：水域深處的狀態——

那些不易察覺卻真實存在的漩渦與暗流。這是水元素的本質展現，如今在宏觀尺度上顯現。無論江河湖海，水的行為皆屬現實，因而影響航行。

凝視深淵實則是在審視人性本質——*conditio*

humana。若忽視作為根基的人類存在，又如何企圖探尋政治的真諦？存在主義的追問固然最初指向哲學神學領域，往往承載個人意義。

然而歸根究柢，人性已編織成更宏大的世界觀，蘊含深遠意義。但若能從這現實深淵中辨識出恆常流動的暗流——它們既是恆常，因而真實——又當如何？

理想主義理論會尋求哲學論述，純粹是為了不致失去立足點，因為它理應始終以最優解為目標。但政治現實主義則必須更聚焦於人類處境：較少分析性地探討根本性存在問題，而更著重於計算實際後果。唯有當現實的所有面向都被納入考量，方能稱之為*真正的現實政治*。

本書致力於闡述此種全面視野。

全球西方與二十世紀歷史有著特殊紐帶，儘管其根源可追溯至遙遠的過去。其根基與人類境況緊密相連，其政治——尤其是地緣政治——

後果指向一個尚無法預見的時代。概念與實質分析揭示了西方的根本公理，並列舉了未來*真實的現實政治*必須銘記的準則。

全球西方 普世主權的哲學與願景

對抗與修辭

政治領域出現了新詞彙：「全球西方」。其前身是兩個直至二十世紀末十年才流行的概念：描述日益緊密全球互聯互依的「全球化」，以及作為發展中國家友善稱謂的「全球南方」。³

全球西方之論述始於千禧年後的漸進發展，如今已融入政治語彙，尤以地緣政治領域為甚。此概念通常涵蓋所有曾被歸類為西方世界或西方陣營的國家——彼時東西方對抗主導著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國際格局。

西方陣營由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工業化國家組成，這些國家實行憲政體制；而蘇聯的盟友則在東方形成對抗勢力。當歐洲分裂局面終結後，全球化論述隨即興起，且不僅限於全球貿易領域。

世界彷彿已成為地球村，全球性問題得以更有效解決。在聯合國等組織框架下，最終目標是建立「全球內政政策」⁴

。因此1990年代成為相對緩和的十年。

數十年後的今日，當人們談論「全球西方」時，往往是威權主義⁵

與極權國家發動的修辭攻擊。他們試圖描繪一個強大且全球活躍的聯盟，將其塑造成威脅所有其他國家的存在。

與之對立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群體——

這群界定模糊的國家雖抱持不同抱負，但無論如何都不被視為「全球西方」的一部分，反而被視為其受害者。當權威主義國家感到不安時，往往將自身歸入全球南方陣營，或至少宣稱與之團結一致。

這種假想的全球對立，令人聯想起二十世紀用以描述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南北衝突」。該概念除揭示不平等現象外，更聚焦於責任歸屬——工業化國家常被視為壓迫方。

倘若當今議題僅關乎全球財富分配，稱之為「全球北方」或許更為貼切——

儘管此術語本身亦僅具有有限適用性。然而該詞彙並未普及，正如「全球東方」一詞亦不存在，後者本可作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的統稱。事實上，這既非單純財富問題，亦非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殘餘。

3

儘管兩詞皆可追溯至1950至1960年代，直至1980年代才開始頻繁使用。同樣地，「全球北方」一詞亦然。

4

儘管該詞彙最早由物理學家兼哲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於1963年提出，卻是在歐洲民主浪潮興起後才廣為流傳。

5

從批判角度審視，此術語實為一種委婉說法——既喚起對威權式教養的聯想，卻又暗含對孩童的某種慈愛與尊重。而用「威權」形容踐踏個人尊嚴與權利的獨裁政權，則是政治正確思潮的產物，其內涵顯而易見。

歸根結柢，「全球南方」是個驚扭的術語，旨在對立於修辭上被妖魔化的西方，因而刻意保持模糊與曖昧：它指涉的是一條威權國家軸線——儘管成員絕非同質，卻始終捍衛自身與西方的差異，並常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更優越的替代方案。⁶

地理與歷史

遠離當今西方政治化的語境，其概念起源主要源自歐洲中心主義的製圖學，該學說同時塑造了西方與東方（Occident and the Orient）的論述框架。東方——旭日升起的國度——與西方形成對比，後者則是夕陽西沉之地⁷。西方是否止於大西洋，抑或在發現新大陸後延伸至美國，這或許見仁見智；東方究竟位於阿拉伯半島抑或遙遠的日本，同樣存在爭議。歸根結柢，地球上每個點都有其獨特且相對的參照系，因此在此語境下談論西方具有歷史內涵。

在近代歷史演進中，昔日的地理對比已轉化為意識形態對立，並衍生出地緣政治意義。然而其成因與趨勢如此多元矛盾，原始的對抗性早已超越特定地域或宗教範疇。

即便經常被引用的西方宗教與東方宗教之對比，經細究亦顯得更為複雜。⁸所謂科學西方與非進步東方的區分同樣存在局限。依地域與文化圈而異，此種對比確曾存在且至今可見，往往極為鮮明。然此現象同樣適用於其他大陸與社會。歷史上諸多發明源自東方，哲學著作經阿拉伯征服的西班牙傳入歐洲，自十六世紀起該地區更主導新興科學發展。

在此背景下，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區分了東方與西方的經濟體系，認為後者具備高度理性化特質。市場活動不再依賴人際關係，而是由冷靜的價格計算主導——從而提升生產效率。

二十世紀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成功，激發眾多國家效法此路徑現代化的意願

6

核心政治術語同樣面臨概念競爭。例如中國政府針對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發起的「民主峰會」，發表了題為《行之有效的民主》的文件予以回應。

⁷ 古希臘語Ἑσπερος/hesperos（傍晚）與拉丁語vesper（黃昏）皆源自印歐語系詞根*wes-（傍晚/夜晚）。

⁸誠然，基督教一神論的西方可與以印度教與佛教為主的東方形成對比——

但此對比僅限於特定歷史時期與地理範圍。然而必須忽略反向趨勢：既包括古埃及、波斯的一神論思潮及東方宗教，也包含西方世界的泛神論思潮。

，即發展其潛能⁹

。另一方面，歐洲對看似遙遠的東方（乃至更遠）文化的迷戀，實則源遠流長。

儘管存在諸多矛盾趨勢與發展，有一點始終清晰：當今對立的核心並非不同宗教傳統、建築風格、語言或習俗。這些差異或許伴隨並彰顯某些對比，但根源遠比地理因素更為深遠且早已超脫地域限制。這關乎人類存在的根本命題，以及哲學所提供的解答。

哲學與政治

當我們將哲學搖籃定位於古希臘時，必須認知到：諸多思想概念雖在不同文化中萌芽，或許曾被討論，卻未必留存文字。唯有當思想脈絡未湮沒無蹤，而是融入社會並得以傳承，這些發展才具歷史實質性。¹⁰

在此意義上，希臘哲學家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他們對世界與人類處境之間關聯性的思考方式，使他們永遠留名史冊。此處既是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歷史起點，亦是全球西方世界的哲學根基所在，其名稱的淵源亦可追溯於此。

希臘哲學的興盛，源於地中海地區的文化交流與蓬勃的貨物貿易，共同孕育出能自由探討存在主義問題的氛圍。荷馬傳承的傳說已遠離當代，勇敢的思想家們正為古老的疑問尋求嶄新的解答。

這條新路的首要探索，是對自然及其運作法則的闡釋。關於原始物質與元素的早期理論初現端倪，卻因缺乏技術設備而無法驗證。然而最終留存的遠不止於空想：在現代物理學誕生兩千五百年之前，原子、元素、原始原理等基礎概念的雛形已然在此時代成形。

希臘哲學的第二支柱探討人性本質，既關乎個體存在，亦涉及社會角色定位。其核心議題涵蓋知識本質、正義生活與社群共存之道。廣義而言，政治¹¹

9

就此而言，「發展中國家」一詞最初蘊含著對未來的期許；發展目標自然指向經濟與政治哲學層面。

10

許多先進文明中，皆可獨立發現哲學概念的傳統脈絡。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亦將公元前800至200年間稱為「軸心時代」，因「中國、印度與西方在數世紀內幾乎同時奠定核心哲學基礎，彼此卻互不相知」。（《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年，第20頁）

¹¹ 此處政治概念採亞里斯多德廣義詮釋，其將人類定義為「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

與倫理問題主導了哲學論述。此領域同樣孕育出奠定當代理論基礎的模型。綜觀而言，希臘哲學為西方文明構築了核心的智識根基。¹²

另一次新起點宣告了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中世紀末期，日益繁盛的貿易——如同古希臘時期——

與城市興盛緊密相連，城市財富滋養了科學與文化的蓬勃發展。歐洲各地相繼創立大學。

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人類逐漸能夠破譯自然法則、探索未知領域、開闢環球航線。科研浪潮隨即推動技術、醫學及日常用品生產等領域取得空前進展——

這股發展勢頭延續至今。科學進步及其成果自此深刻塑造人類生活，更成為西方生活方式的標誌。

然而，研究與科學是普世現象。儘管它們可能在歐洲-

西方文化中取得突破，但可以預見，理論與實踐中對世界的科學方法終將成為全球的常態。

然而科學進步及其成果僅是「西方認同」的某個面向。*西方本質*的構成要素在於將人類視為獨立行動者：個人在私領域享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權利，並擁有參與政治與社會決策的權利。國家權力雖本質上源於主權者——

人民——的意志，但個體的個人主權則源於不可侵犯的人類尊嚴。從最早的人性思辨，經希臘哲學與啟蒙時代，直至當代「西方」認知，這段

漫長旅程充滿矛盾與挫折。然而終究是這個人類圖景，奠定了自由導向民主社會的根基。

在這樣的社會中，國家的職責在於保障每位公民的個人自由，並透過適當程序確保所有政治決策的民主根基。由於實務上需要法規制度、司法機關與行政權力，所謂「西方」國家只能以憲政國家的形式存在，而非鬆散無約束力的社群。個人必須能隨時確信自身尊嚴與權利受到保障。

主權與主權體系：終極的正當性基礎

西方文明依賴於上述關於人性尊嚴與個人及政治主權的理念——

此理念既是哲學概念，亦是政治乃至地緣政治範式¹³

¹²

此外還包含羅馬法原則，以及在歐洲的猶太-基督教宗教影響。這三者被視為歐洲的構成支柱。希臘羅馬古代的終結常與公元529年雅典柏拉圖學院的關閉相提並論，而與此同時，蒙特卡西諾山上創立了第一座本篤會修道院——這標誌著基督教影響下的歐洲中世紀的開端。

¹³

將範式視為詮釋與理解的整體框架概念在此尤其具合理性，因其不僅涵蓋科學理論層面（此概念原生於此——參見湯瑪斯·庫恩，1962），更觸及存在主義、實踐層面及（地）政治根基。

。人性觀及其終極正當性，決定了何種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秩序方符合人性本質。我們對此秩序終將延續的確信，恰如對符合宇宙本質的科學世界觀終將勝出的確信。

最常見的異議源自自然科學領域，其核心論點可歸納如下：既然宇宙萬物皆遵循物理定律運行，此法則同樣適用於所有物體、生物及人類。從心跳到大腦最精微的運作，一切皆屬純粹物理現象，是漫長而複雜的因果鏈環節——猶如生物學領域中的鐘錶機制。

人類既無超自然的靈魂，亦無超越自然法則的自由意志，更無法確立任何尊嚴的本質。科學研究無法觸及的事物，便不具真實性。¹⁴

儘管隨著科學成就日益輝煌，這種「自然主義」世界觀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但它存在著根本缺陷。即使它反覆給人一種物理命題的印象——所謂多年研究的結論——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物理世界觀的範圍問題已不再是物理問題，而是哲學問題，因而存在於完全不同的層面。

在哲學討論中（此處僅能略作點明¹⁵

），當試圖將自由意志與人類意識還原為

神經過程，或將倫理問題轉譯為純粹心理狀態時，便會衍生出重大難題。

然而，自然主義的人類觀必然將道德與美學問題視為無意義的空洞概念¹⁶

，將人類對正義的追求與意義的探索視為大腦的複雜幻覺與投射——

而大腦本身作為極其複雜的裝置¹⁷

，終究受生化因果律支配，掌控著有機體的運作。

因此，人類將自身視為自主存在者的自我認知，必然預設除物理過程外，存在著超越現實的根基，方能支撐人性精神、尊嚴與自由。順帶一提，此論亦適用於世界的物理構成——

其成因本身亦非物理現象。歸根結柢，物理世界的起源並非物理理論所能解釋，而是根本的哲學命題。

¹⁴

大衛·路易斯（1983，361頁）指出：「世界即物理學所描述的模樣，別無他言。」此立場雖有物質主義、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等不同稱謂，但本質上始終基於相同前提。

¹⁵ 更多延伸思考可參閱本文獨立撰寫的序言。

¹⁶ 「當實證主義理性主宰領域而排斥其他一切……倫理與法律的古典知識來源便遭排除」——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11年9月22日德國聯邦議會演說。

¹⁷

即使偶然性存在，也無法根本改變大腦功能的準程式化序列，僅能透過若干不可預測性使其「鬆動」。

綜上所述，正如康德所闡述的¹⁸

，人類存在的核心命題已超越物理學的詮釋範疇。

最後須指出，自然主義範式極具反直覺性——

因為所有人類（包括其追隨者與倡導者）在日常生活中，皆彷彿憑藉自由意志做出倫理抉擇、進行科學探索並從世界中擷取奧秘。當論述愈趨複雜時，若僅以神經學程式來解釋其發展軌跡與互動模式，便顯得愈發荒謬。無意在此探討具體哲學或宗教概念，但仍可斷言：人類尊嚴（及其衍生的權利與義務）的確立，需要一種超越性的世界觀，此觀點亦須為更深層的存在性問題預留空間。所謂「西方人本觀」——雖非唯一視角¹⁹——

必然預設此種人本觀，進而預設對現實整體的認知框架。

歸根結柢，這並非在多種選項間自由抉擇的任意選擇。事實上，僅存在唯一可得的現實，而它

超乎人類掌控。無論其本質為何——

無論相關論辯如何激烈——

可確切斷言：接受現實本貌別無他途：現實乃終極有效性，凌駕萬物之上：絕對者的主權至高無上。

多重斷裂：進化與革命之間

乍看之下，上述西方概念似乎是源自政治與宗教烏托邦而非現實的模糊社會模型。

批評的核心因此在於：若所描繪的人類尊嚴、權利與主權概念確實符合其本質，而由此衍生的自由社會秩序實為恰當理念，為何它未能在歷史長河中自然盛行，反而屢屢陷入生存掙扎？

乍看之下，此質疑似乎合理；縱觀歷史與當代，此結論更顯不言自明。科學發展之路相對平坦，僅偶受宗教政治影響；反觀社會形態的探索卻顯得迂迴不定，時而迷失方向。為何前路如此崎嶇？

答案在於各種斷層、挫折、頑固勢力與逆流，這些現象可概括為「干擾」。它們具有多元的時空、社會與文化維度，且可能相互強化。

¹⁸ [哲學領域[...]可歸結為以下問題：1) 我能知道什麼？ 2) 我該做什麼？3) 我能期盼什麼？4) 何謂人？]（《純粹理性批判》，B833，1787年）——1897/98年間，法國畫家保羅·高更以相似的根本命題為畫作命名：《我們從何而來？我們是誰？我們將往何處去？》

¹⁹ 那些宣揚主動探索新知、倡導團結價值、論述倫理美學的意識形態與科學，同樣指向超越性的參照系。對這些學說及許多西方生活方式的實踐者而言，此種連結多屬未知或看似無關緊要。

事實上，若非如此，個體將迷失於預設的事件鏈中，所謂精神則會漂浮於永恆流動的心理幻象之中。這將使科學的主張淪為荒謬，並使人淪為可笑的傀儡。

- 暫時性中斷：儘管自由憲政國家的萌芽可於所有文化中尋得蹤跡，但此類國家的發展——縱使早有古希臘等先例嘗試——實屬相對近代的產物，且未曾獲得民眾廣泛支持。直至十九、二十世紀公民覺醒自身賦權與主權意識之際，人權與民主理念方得以生根發芽——其間歷經眾所周知的阻礙與挫折。
- 地域性中斷：當西方價值觀在世界某區域得以確立之際，傳統體制在其他地區仍維持其地位。此現象或源於對自身主權的認知缺失，故可稱之為對自身成熟度的啟蒙不足。與此同時，政治或宗教勢力正延緩著這種自然發展進程。
- 時間性斷裂：儘管主權意識乃人類存在之本質，歷史卻屢見復古與反動思潮興起，對曾經歷艱辛才獲得的價值觀提出根本質疑。即便西方價值觀及其伴生的繁榮已具全球吸引力，歷史發展絕非自動運行。迄今最重大的倒退當屬歐洲法西斯主義時期，尤以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為甚。²⁰
- 個人層面的動盪：無論是普通公民或政治領袖，對自由民主的認同都可能在不同層面削弱甚至逆轉。即便對社會、經濟或政治發展的失望，也可能導致人們拋棄人類共存的最根本支柱，此類轉變往往伴隨著社會全面倒退的風險。
- 文化性動盪：縱觀自詡自由民主的社會，即便在國境內部，對於應以何種基本價值奠定國家根基亦存在分歧。這不僅關乎可透過民主程序決定的個別法律與政治方針，更涉及倫理、政治、宗教及文化等根本性命題。縱觀各國，對民主與自由的理解亦存在或深或淺的差異。²¹

20

社會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將戰後德國啟動的民主重整描述為「一個經濟與政治的進程，後來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文化進程，唯有當文化西化滲透至全民思維時，此進程才將不可逆轉」（摘自1989年7月與芭芭拉·弗萊塔格的訪談）。

21

當然，一個社會對個人尊嚴與自由的真正認知，並不會體現在雙腳踏實、收入中等的中年人身上。真正的價值體現於年輕人、老年人及社會弱勢群體的處境，體現於監獄、軍隊等可能影響個人主權的機構與權力機關的運作狀態。

- **戰略性斷裂**：為抵禦擴張主義與威權勢力捍衛自由世界，並確保自身生存所需——軍事基地、原材料、盟友——往往迫使國家與內部體制背離自身價值觀的國家建立戰略聯盟。此道德困境顯而易見，可能導致公民與政治人物陷入危險的冷漠。²²這類聯盟易營造出平等共存的假象，令人誤以為永久共存具有正當性。

若將基於法治的自由民主原則之發現與實踐視為跨文化差異的漸進發展，則必須從初始階段就預期此類差異。縱使歷史上屢見從獨裁走向民主的革命浪潮，歷史進程本質上仍是演化性的。

地緣政治與願景

假設上述在開放於超越性世界觀框架下的人類概念確實對應現實，則可推斷：儘管可能遭遇挫折，自由民主國家的理念終將在歷史長河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

此觀察早在二十世紀便已顯現：當個體尊嚴與自由不僅源自哲學概念，更與全球各地民眾的意識產生共鳴時，此趨勢已然清晰。²³

事實上，1990年代爆發的諸多民主進程與和平倡議，曾促使部分學者預見「全球內政」²⁴的崛起，認為其將逐步化解國際衝突。

然而從地緣政治角度觀之，各國正依循自身步調與條件邁向民主共同體的願景，如今已被相反的現實所取代。因為在「自由世界」國家²⁵之際，始終存在著若干專制政權，其首要目標在於維持權力或推行政治宗教意識形態，並必要時團結對抗西方世界。這些政權或許暗自懷疑自由之路終將開啟、甚至必然降臨，卻抗拒此認知及其衍生後果。歸根結柢，他們抗拒的正是無法抗拒的現實。

對立原則：「兩個世界」

²²

那條流傳千年的戰略原則「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或許在生存危機中具有戰略合理性，但它無法取代（權力）政治決策的倫理基礎。

²³

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早在1989年就提出「歷史終結」論，當時全球民眾紛紛要求權利與主權，這顯然已成為普世訴求。

²⁴ 參見註腳4。

²⁵ 這個替代術語同樣承載著歷史包袱——自東西方衝突以來。

在國際政治舞台上²⁶

，威權國家與自由國家之間存在著本質上非對稱的重大衝突。其根源在於對社會共存的對立觀點。

在民主世界，國家存在是為了公民。其唯一正當性在於保障人民尊嚴生活，並盡可能抵禦對其主權生活方式的任何侵犯。自由社會中，國家必須為其行為辯護，證明更嚴格的限制是必要且無替代方案的。不是公民必須為自由辯護，而是國家必須為其干預行為辯護。

在威權與極權國家中，此原則徹底顛倒：國家及其政治領導層——

無論基於宗教、政治意識形態或個人意志——

皆居於至高無上之位。個人（若尚能稱之為個人）在各方面皆臣服於這種國家理性之下。

當然存在漸進差異：「溫和」的獨裁政權可能放任經濟社會活動，僅打壓政治批判；而極權體制則企圖任意操控人民的思想乃至生存本身。然而歸根結柢，個人面對統治體制皆無力抗衡——

既無法主張權利亦無從捍衛尊嚴，其行動自由皆由上而下賜予，隨時可能遭限制或撤銷。生存風險如影隨形，扭曲著社會共存的每一個細節——

有時甚至扭曲個人性格。國家理性——政權的存續——

主宰並滲透人類存在的每個層面。²⁷

國際層面

這種威權國家的優先考量在國際層面亦有所體現：所有努力皆指向確保統治政權的存在與權力，其他政治或意識形態目標皆服從於此目標。

由於維持權力至上已意味著人權與生態文化價值在國內遭壓制、忽視或打壓，這些價值對獨裁政權的國際關係亦毫無意義——

除非作為對抗真實或假想政權威脅的宣傳工具。

威權體制面臨的直接威脅來自同類政權：由於它們既不尊重公民主權亦不尊重他國主權，彼此關係缺乏約束性規範——

強權法則至上，對外施加暴力始終旨在確保政權存續。國際層面實行弱肉

²⁶

這個隱喻性詞彙令人聯想到戲劇，但當數百萬人喪失生命與尊嚴，數十億人遭受政治、社會與經濟衝擊時，這種聯想顯得極其冷酷。資源的破壞正以全球規模發生，最終將影響地球上幾乎所有人。

²⁷

實際上，這些詞彙指涉的是勞動與滅絕營、酷刑中心、壓迫與難以想像的暴行：它們是存在主義最深的深淵。

強食法則——生存需仰賴軍事力量。

在互不信任的氛圍中，同盟關係往往搖擺不定，自身生存時刻面臨威脅。對壓迫性政權而言，根本性的內部威脅來自其公民——

他們可能反抗壓迫並要求個人與政治權利。儘管民主國家原則上支持受壓迫人民，並在國際層面捍衛

其權利，但行動通常僅限於表達聲援與通過決議。唯有在極端例外情況下，才可能出現涉及武力干預的積極援助。

自由世界雖能結盟抵禦獨裁政權的軍事攻擊，但援助受壓迫人民的手段仍相當有限。

民主國家普遍迴避使用軍事武力或政治壓力，因其根基在於協商、理解與善意。此外，外來干預總面臨民眾質疑的風險，迫使政治決策者撤回支持。每逢選舉更可能引發政治風向轉變，甚至導致歷史性聯盟瓦解。

對變革的開放態度，以及政治領導層對主權公民意志的依賴，是自由社會的核心特徵。與此同時，這種透明度與開放性也成為威權國家軸心可乘之機。

因此，它們試圖透過各層級的政治宣傳操縱輿論與投票行為，並藉由操控危機來挑戰相關社會。

手段涵蓋蓄意散播虛假資訊、製造外部邊境移民壓力，乃至軍事挑釁與攻擊。此外，反對威權軸心的公民與組織更承受持續施壓，成為媒體攻擊或肢體暴力的標靶。其終極目標在於透過全方位行動動搖民主國家根基，藉此阻撓其維護與促進全球自由的承諾。

即使在政治人物之間，對這些權力與影響力的認知也相當有限。相較於對政治局勢的冷酷分析，人們更傾向相信威權國家渴望和平共處並具備民主發展的潛力。²⁸

此外，自由世界——*全球西方*——的原則屢遭誤解與淡化。

西方的公理

²⁸ 冷戰期間所謂「和平共處」的說法具有欺騙性，不僅因為同期仍存在衝突。儘管超級大國間的核武僵局使直接軍事衝突成為不可能，但真正的和平共處僅在蘇聯變革與東歐動盪後方能實現。此類強迫共存本質上僅是暫時的，如同專制政府與受壓迫公民之間被迫的內部共存。

相較於世俗與宗教意識形態，西方特徵在於某種程度的克制：它缺乏終極論範式、經濟規劃藍圖與烏托邦社會模型。自由尊嚴生活的承諾看似空洞無物，實則關乎若干根本面向與結構²⁹。西方的自由亦具公理層面：

1. 絕對主權：開放的超越性基礎

此種現實觀是理解人性及政治科學活動的必要基礎。唯有立足於此，方能進一步探討存在主義面向，並容納多元意識形態與宗教參照。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自由開放言論，正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精髓。

2. 個人的主權：塑造自身生命的權利

人性與尊嚴奠基於對現實的超越性理解。此種人性觀衍生出保障個人塑造自身生命主權的基礎人權。人類存在的此種存在核心本質上不容質疑：個人主權不可侵犯，即便在民主決策中亦然。

3. 人民主權：社會自主決定自身事務

社群的政治規範必須具有民主淵源，即建立於選舉與公投之上。社會發展本質上是開放的。人民主權體現了國家層面的個人主權——兩者相互依存：正如個人自由在政治參與中得以彰顯，民主亦奠基於政治成熟（因而同樣自由）的公民基礎。

4. 價值觀凝聚的團結，而非利益組織的團結

相較於威權國家基於可能矛盾且易變的主觀利益結盟，西方思想根基植基於超越性理念：價值與尊嚴不可妥協，它們深植於更深層的客觀現實，因此具有普遍適用性。在國際層面，此哲學對立必然催生西方國家間的團結——縱使面臨最尖銳的政治分歧亦不容動搖。這更包含共同抵禦威權主義擴張的立場。

5. 地緣政治願景：普世西方

²⁹

此處所指並非自由憲政國家中完全可預見的官僚體系及其利弊，而是指放棄對人類進行意識形態的「程式化」。

全球西方計畫乃普世性事業，僅能基於倫理考量，在過渡階段與威權國家共存。若認可普世人性尊嚴與權利為所有社會根基，則漠視此原則即為必須克服之惡。威權體制本質上無法永續存續，故其生命力終將受限，此乃普世西方成為西方本質核心關切⁽³⁰⁾且不可分割之緣由。由於缺乏對人民的民主問責——究其根源在於其與現實哲學基礎的矛盾——威權政府因這種互惠缺失，至多僅擁有有限主權。³¹真正的現實政治學，即始終將人類處境與地緣戰略條件並列為行動基礎的政治立場，絕不可遺忘這些關聯。因此它唯有立足於本文闡述的西方公理基礎方能蓬勃發展——無論這些公理在遙遠未來將被冠以何種稱謂。

後記：未來二十五年的三項箴言

東西方對抗終結後的初始歲月曾充滿希望，至少為全球每個角落投射出微弱曙光，但千禧年之際起，國際局勢在多地再度陰霾密布。

在國際層面，上世紀的體制衝突以變形姿態重現：以壓迫性政權為軸心，結合威權或冷漠國家網絡的勢力，正致力建立反制自由世界的對抗運動，逐步取代其地位。

面對這項歷史性挑戰，全球西方長期採取防禦性策略，卻忽視威權浪潮在軍事、政治及哲學根基層面日益增長的威脅。這種侵蝕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多個國家內部正浮現威權傾向；另一方面，相互合作——

包括軍事團結——正遭受嚴重威脅。

在這場歷史考驗中，我們需要回歸自由主義運動的根本基石，但更需要堅信：當自由社會遭受壓迫性侵略者威脅時，絕不會不戰而降。自由的力量根植於超越政治操弄與軍事壓迫的領域——

歷史已證明且將再次證明，自由終將勝利並彰顯其力量。

自由世界的概念終將消逝，但並非因威權體制扼殺了它，而是因為其必然的對立面——壓迫浪潮——有望在不遠的將來退去。

³⁰

相較於1990年代的經濟與通訊技術全球化，當今我們所見的是基於哲學世界觀的人類尊嚴全球化。這絕非要以單一文化取代人類的種族多樣性。

³¹

在特殊情境下，例如推翻獨裁政權時，政府合法性可能暫時脫離民主程序而產生。然而無論何時何地，個人主權都必須被賦予最高優先權。

未來數十年的挑戰可歸納為三項基本準則

1. 回歸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哲學根基及其政治後果

二十世紀的哲學正確性，如今在許多情況下已被漠視與相對主義所取代。當今社會對生活各層面意見分歧極大，連日常政治議題都常演變成巨大挑戰。這使得追尋自由世界的根基顯得愈發徒勞，因為這涉及人們或許容忍卻絕不願討論的哲學或神學層面。正因這種消沉必然導致視野匱乏，進而引發意義危機，我們必須從此處著手。

個人尊嚴作為所有自由個體與國家存在的起點，必然預設了對現實的超越性理解。此根基——至少其核心面向與衍生影響——

必須置於政治行動的核心，並在某種程度上植入人民的意識中，畢竟他們的存在終究源自於此。

2.

自由世界地緣戰略定位與互惠安全機制：應對共同體內在不確定性的對策

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自然存在著某國可能從自由世界聯盟中*政治或軍事*撤出，或對其提出質疑的風險。此類變故必須預先預見，並在各層面採取預防性對策。

作為主權者，人民隨時可能透過投票削弱現存價值聯盟。然而，*個別民主國家本身*應透過制度設計，

避免自我瓦解。若能在國家聯盟框架內建立更強有力的保障機制，將更為理想。

自由世界作為價值觀聯盟，必須為自身武裝以防範安全風險——

若某個核心安全保障者或多個較小保障者消失，此類風險便會浮現。除具備地緣戰略意義的國家儲備外，這還需要建立盡可能具韌性且不受國家單邊行動影響的安全架構，並能最大限度遏制威權網絡發動的攻擊。

3.

在認知自由歷史性勝利的基礎上，於國際層面對自由世界保持一致且持續的承諾

相互安全的目標不僅在於捍衛狹義*國家利益*層面的主權，更在於守護自由世界的歷史成就——盡可能避免倒退——

並實現基本人權的普世訴求。因此，捍衛全球西方終究始終符合道德上正當的國家利益。³²

全球西方國家理應持續拓展並鞏固國內自由民主秩序，避免因制度缺陷而使自由理念蒙羞。

對外則必須明確無誤地展現對威權模式的反對立場。

在哲學層面，獨裁政權的存在本身便是對絕對真理的冒犯³³

。其統治與獲取的利益皆屬相對，其意識形態若具形體，不過是虛假哲學

其結局早已注定：終將歸於虛無。所有權貴的榮耀終將在真理面前化為塵土，唯敢於轉變方向的領袖例外。

上述箴言並非烏托邦或原教旨主義綱領，亦非否定外交、地緣戰略與現實政治³⁴

。其首要訴求是徹底而非敷衍地回歸傳統，繼而抵禦二十一世紀日益顯現的諸多不確定性。

最終目標乃是人權普世化——

除此之外別無他求，這意味著 為所有人創造自由世界或建立普世西方——對於過去三百年間的人權宣言而言，此目標已不應再受質疑。³⁵

³²

基於人權與基本價值的政策，既不能對飢餓、苦難與壓迫視而不見，亦不可聲稱衝突不屬於應解決的「國家利益」範疇。至於實際行動方案的具體樣貌，自然又是另一回事。

³³

要精煉地描述那些陷入根本性理論與實踐迷失的政權之虛幻本質，實難找到更簡潔的表述。

³⁴

此處所謂現實政治，並非指機會主義的政治操作，而是指一種全面的政治風格，這種風格意識到現實——包括超越現實的現實——及其影響。

³⁵


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談及人的尊嚴，而其美國與法國的前身則論及不可剝奪的權利，兩者皆暗示著非實證主義的基礎。

© 二十世紀研究計畫——全球西方哲學

更多資訊與聯絡方式：

二十世紀研究計畫
www.20th-century.net

全球西方哲學
www.theglobalwest.com

 www.steff.international/CONTACT/

- 版本 1 / 2026 -